



甘子日報
GANZI RIBAO

康巴周末

文化视野

2026年3月2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泽仁 校对：刘娅灵
版式设计：边强

8

从康巴人生存心境进入
从康巴人生存智慧进入
从康巴人生存哲学进入



书评

绘就温情画卷

读朱幸福的长篇小说《马上调解》

◎阿敬

当法律条文遇上乡规民约，当现代治理撞上传统伦理，故事中的“男一号”老马便成了难得的“纠纷调解员”，成了行走的“矛盾粉碎机”。虽然他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什么高深莫测的理论，却能凭着一句“马上到”“马上办”的口头禅，成为让水镇群众心中的“定心丸”。老马就像邻家大叔，懂法律却不摆架子，讲原则又富有人情味。面对婚姻破裂的夫妻、为宅基地争执的邻里、因债务反目的朋友等等，老马总能巧妙又迅速地找到矛盾的症结所在，然后“化干戈为玉帛”。书中50个既独立又关联的故事，如同生活的多棱镜，折射出基层社会的百态人生：杨健与奚溪的婚房分割纠纷里，藏着婚姻里的现实与妥协；刘金兰冒着生命危险生下的孩子，牵扯出夫妻间的责任与凉薄；还有为田埂、池塘、宅基地争执多年的乡亲，在老马的调解下纷纷放下了执念……这些故事通常少有欧·亨利式的反转，却处处透着鲜活

的真实——好似你我身边随处可见的家长里短，那些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往往缺的只是一个懂倾听、会变通的中间人。诚然，基层调解从来不是双方“各打五十大板”那么简单，而是一门兼顾法理与人情的艺术。老马的调解，恰在于既讲法理底线，又留人情温度。他深知，生活如一团麻，基层矛盾往往“法中有情，情中有理”，生硬的判决不如贴心的疏导，冰冷的条文亦需温暖的解读。譬如，面对占孝利与6户村民的土地确权纠纷，他既认可占孝利的合法承包权，又不忽视6户村民20年的耕种付出，最终促成双方各让一步；在处理王老太捡废品堆楼道这种“可大可小”的难题时，他亦未简单地批评指责，而是充分肯定老人为垃圾分类所做的贡献，又协调物业找了专门场地，既维护了小区的环境，又照顾了老人的生计……作者通过一个个具体生动的案例，让我懂得“调解不是压制矛盾，而是给伤口结痂的机会”，也让我们看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繁琐与艰难、温度与智慧。

有人说，基层是社会的神经末梢，最能感知时代的脉搏。此言不虚。可以说，《马上调解》不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幅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社会治理画卷。而故事中的每一次调解，都是一次人心的修复；每一场和解，都是一次社会和谐加固。老马用脚步丈量民情，用耐心化解积怨，用智慧平衡利弊，他身上那种“把群众当亲人”的情怀，正是基层工作者最宝贵的品质。在这个节奏加快、矛盾易发的时代，这样的故事格外抚慰人心。小说在字里行间流淌着烟火气，散溢着人性美。老马等人虽是虚拟的，但却有着触可感的喜怒哀乐，能让读者从他们身上看到身边人的影子。尤其是作为清醒的“旁观者”，我们自会了悟，原来所有的矛盾纠纷似皆源于误解、自私与冲动，而“一笑泯恩仇”则需要太多的理解、包容与担当。

作者匠心独运地采用了“扑克牌式结构”，50个故事，如同散落的珍珠被老马这根主线悄然串起。这种结构看似松散，实则暗藏巧思：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次完整的调解实践，而合起来，便能全面展现基层治理的多元场景——从婚姻家庭到土地界址，从物业纠纷到校园安全，几乎涵盖了民间矛盾的方方面面。这种写法亦颇为冒险，因每个故事都要情节扎实、充满张力才能站稳脚跟。恰若《福尔摩斯探案集》通过独立案件塑造神探形象，《马上调解》亦在一个个纠纷的化解中，让老马的形象愈发丰满，让基层调解的价值愈发凸显。作为当代小小说名家的朱幸福，在这部厚重的长篇小说里，凝聚了举重若轻的底气与另辟蹊径的勇气。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佳作，《马上调解》的价值不仅在于文学表达，更在于其时代意义。小说生动诠释了“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的实践成果，展现了基层治理中“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生动实践。要知道，一次调解，便是一次法律常识的普及；一次和解，便是一次社会温情的传递。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这样的作品既传递了人间自有真情在的满满“正能量”，让我们看到了基层工作者的艰辛与坚守，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法治社会建设的坚实步伐。

掩卷回首，老马的身影依旧清晰：他奔波在田间地头，穿行在社区街巷，用耐心化解戾气，用智慧平息纷争，用温情凝聚人心。朱幸福用质朴、细腻又生动的文字，为基层调解员立传，为烟火人间写照。在这个矛盾与发展并存的时代，《马上调解》如同一泓清泉，晶莹剔透，涤润心灵，给人启迪。是的，只要有公正，手有方法，胸有热情，再复杂的矛盾也能化解，再遥远的距离也能拉近，而实现中国梦的个人力量，也才能汇聚得越来越磅礴……

书评

在生活激流中荡起评论的双桨

读马忠的《字隙流光》

◎李宗刚

初读马忠这篇评论《赵德发研究资料》的文章，我便对素未谋面的马忠有了“想象性建构”：这是一位意气风发的青年，是一位对文学评论怀有赤诚情结的青年，是一位能敏锐捕捉当下文坛与学术界最新信息并作出迅即反应的青年，是一位不知疲倦地兼顾文学评论与图书评论写作的青年。带着这份印象，我与马忠互加微信好友，此后便在数字空间多有互动。然而，令我意外的是，他并非寄身于大学或科研机构“职业学者”，而是供职于宣传部门的“编外研究者”。这让我对他更添一分敬佩——他的文学评论与图书评论，并非出于“为稻粱谋”，而是源于内心热爱的“为事业谋”。正是基于这一点，他的文学评论与图书评论呈现出一种新的气象，一种迥然区别于学院派批评的鲜活气象。

在常人眼里，文学评论与图书评论主要与学院派批评家相联系。学院派批评家的学术研究几乎涵盖这两大领域，这也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根基之一。这批评家长期置身于院墙之内的大学或科研机构，文学研究与社会现实难以真正“水乳交融”，往往处于“油水分离”的状态。人们将这类机构称作“象牙塔”，着眼点正在于其远离社会现实。值得欣慰的是，在大学与科研机构之外，还有一些人，不以学术为职业，而以学术为志业。他们不囿于理论教条，而是在社会现实与文学世界之间架起桥梁；他们对社会现实有真切的感悟与把握，对文学有独到的理解，对文学作品、文学研究著作有个性化的判断。

正因如此，他们写出的文学评论与图书评论，少了学院派的匠气，多了个人的真切感悟，在“我手写我口”的自然状态下，走出自由率真的写作之路。马忠的文学评论与图书评论，便属于这一类型。马忠供职于广东省清远市委宣传部，对中国社会的体察深入“地市级”层面，因而对作为文学与图书接受主体的普通读者有更真切的认知。他从事文学评论与图书评论，又不局限于“地市级”视野，而是注目全国文坛，及时跟踪文学最新发展态势并作出独立回应。当初读到马忠对《赵德发研究资料》的评论，我便颇感惊喜——没想到远在南方的马忠，对北方作家赵德发的创作与研究如此熟稔。马忠不仅关注当代主流文坛动态，还将研究视野延伸至民族地区文学领域。其《楚雄文学界何以成为“攒动的群山”》（见《博览群书》2019年第8期）一文，便对杨荣昌《攒动的群山——楚雄新时期文学论稿》作出了同情之理解的解读：“作为同行，我感佩于杨荣昌的执着和认真。这种精神在《攒动的群山——楚雄新时期文学论稿》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作者对所从事的楚雄新时期文学研究的意义抱有坚定信念，对所研究的领域持守开拓不止的追求态度。读者总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弥漫于其中的为学术研究所必需的执着精神。这样的学术精神，与当代学术界时常显现的急功近利、浅尝辄止的浮躁之气形成了鲜明对照。”其实，在这篇书评中，马忠借助杨荣昌的文学论稿所阐发的，正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批“同行”以文学研究为“志业”的精神操守。

由此说来，新时期文学创作、文学评论与图书评论之所以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态势，正是一批来自不同行业的研究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作为身在学术体制之外的评论者，他们鲜有体制内对利害得失的算计，也不太顾及学术评价权力的偏向，文学评论因而多了几分率性与自然。马忠收录于《字隙流光》中的“文艺观察”系列评论，便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他在《发挥文艺评论价值引领功能》一文中重提文艺评论的价值引领功能，针对的正是当下流行的“友情批评”这一“失常”现象：“健康的文艺评论，历来应该是实事求是、旗帜鲜明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如果只允许庸俗的捧场，不允许直言的规劝，这样的文艺评论就谈不上健康，更谈不上发挥引领作用。评论者常常在‘说真话’与‘得罪人’之间徘徊，既要面对创作者的情绪，又要承受读者的质疑，这种双重压力使得文艺评论成为一项充满挑战的工作。”为此，马忠重申文艺批评的旨归：“文艺评论工作者必须坚守‘批评精神’，以独立的思想、敏锐的眼光和真诚的态度，对作品进行深入剖析。既要敢于指出问题，也要善于发现亮点；既要批评不足，也要鼓励创新。”如此看来，针对当下愈演愈烈的不良文风，马忠重提文艺评论价值引领功能，绝非“老调重弹”，而是力图“让文学批评这把刀，雕出文艺的真灵魂”，这样的呼吁具有现实价值与意义。诸如《新大众文艺，到底新在哪儿？》《基层文艺评论大有可为》《保持与文本“对峙”的能力》等文章，正是他“观”社会现实之“象”后开出的针对性“药方”。我们常强调作家要深入生活，对批评家深入生活这一命题却提及不多。事实上，真正优秀的批评家不会把自己关在“象牙塔”内，仅凭几本经典理论书便获得介入现实的能力，而是将理论阅读与现实观察有机结合，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重获文艺批评的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以马忠为代表的非学院派批评实践，可为学院派批评带来启发，也为学院派批评家校正自我评论方向提供契机。

身学术体制之外，少有学术评价标准的规训与制约，使他们能更自由地挥动文学评论的翅膀，为读者奉献更有营养的评论成果。马忠本书下编“墨韵评章”所收录的图书评论，正是如此。他的图书评论涉猎广泛，涵盖儿童小说、诗歌集、散文集、人物传记等多个门类，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架起沟通桥梁，其导引式解读为读者了解、走进作品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例如，对诗集《玩水的童年》的评论别开生面，从意象建构、语言锤炼、哲思表达等多维度切入，对读者解读诗集颇具导引作用；对散文集《那年春节没回家》的分析着眼于“三美”，条分缕析、层层深入，评论自带散文韵味；对散文集《黔东南漫记》的鉴赏坚持知人论世，为读者通往散文世界搭建了桥梁。

当然，我将马忠的文学评论与图书评论视为区别于学院派的类型，并不肯定学院派之外评论的自由品格，并不意味着我对学院派文学评论持否定态度。其实，学院派与非学院派的文学评论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学院派批评家应学习非学院派批评家不为既定格套所羁绊的自由率真，非学院派批评家也应学习学院派批评家恪守学术范式的严谨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忠的文学评论要实现自我突破与超越，依然“道阻且长”。我期待，马忠在兼容学院派优长、贯通东西方文化的平台上，为新时代文艺评论的繁荣作出新的更大贡献。